

精神分析的危机

——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

〔美〕埃里希·弗罗姆 著

许俊达 许俊农 译



21178917

1988年·北京

1178917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Essays on Freud,
Marx and Social Psychology
by Erich Fromm

根据英国企鹅图书有限公司1970年版, 1978年重印本译

精神分析的危机

——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

〔美〕埃里希·弗罗姆 著

许俊达 许俊农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139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 第1次印刷

ISBN 7-80049-130-7/B·7

定价: 1.90元

文化

《国际文化思潮》丛书

编者寄语

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是：交流与对话；最富力度的呼声是：理解与宽容；最紧迫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与和平。

人类经过漫长的艰辛跋涉，已处于20世纪末期，即将进入下一个百年。一颗颗骚动不安的心灵：在沉思、回顾、反省、展望、抉择……。

我们面临着一个人类的大文化圈。科学技术，电子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念，地球作为一个地域共同体业已形成。各种文化相互冲撞，彼此碰击，呈现一幅或渗透，或排斥，或融合的图景。但是，由于语言、种族、疆界和历史背景的差异，这个文化圈还不完善，尚未成为一种多元的，充满张力的文化共同体。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数千年的华夏文化绵延不绝，形成一整套富有特色的文化模式。中外文化在思维方式、情感表达、价值观念诸方面的心理间距，既造成国际对话与交流的困难，又凸现这种对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要想走向世界，首先要让世界进入中国。因而，“国际文化中国化”便构成本套丛书的宗旨。

国外学者的著述浩如烟海，学派林立，思潮迭起。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尽快更多地了解国际文化思潮的发展动向？如何准确地把握国外人文科学纵横交错的脉络？这里显然存在一个视角与取向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编辑了这套“国际文化

思潮”，以一种立体意识展现当代国际文化发展的概观，在国外著述者与国内读者之间建立一条心理联系和文化交流的纽带。

本套丛书力图体现以下四个特点：

1、多角度的综合性介绍。现代文化发展特点是各领域的相互渗透，以致于想在其间划一条严格界限已不可能。所以，我们尽可能涵摄广泛的领域，进入众多的学科，从总体上把握当代国际文化。

2、有重点的代表性介绍。当今，想无一遗漏地了解国外各门学科和流派，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所以，我们在相近学科中取有代表性的学科，在同学科的著述中取有代表性的著述，在各种有代表性的著述中选择影响大，现实感强的著述作重点介绍。

3、突出思想性的学术性介绍。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既为沟通联系、增进了解，也为彼此取长补短，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保证交流内容的思想性是使交流健康发展的前提。所以，国外那些有学术价值、有思想深度的著述，将优先选入本丛书。

4、注意可读性的通俗性介绍。思想的深刻不等于语言的晦涩。在保证以上三个特点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考虑著作的可读性，多选择文体优美、充满力度的著述。

《国际文化思潮》丛书主要是在学术界老前辈的关心指导下，由在京的青年学子创办的。它旨在将作者、编者、译者、读者汇入一个共同的文化传播网络，其中，读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型的文化交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各方面的积极主动的参与。每个读者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去选择，去阅读，去思考，并融入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观。在相互交流，对话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崭新的“视界融合”。

1988年1月

译 序

埃里希·弗罗姆是当代闻名遐迩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他于1900年3月23日出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笃信犹太教的大家庭。作为一个独生子，他性情孤僻，娇生惯养，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弗罗姆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攻读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在大学期间，他一接触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便迫不及待地研究起来，从此与这两种学说结下了不解之缘。1922年，弗罗姆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在慕尼黑进修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然后到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直至1931年。起初，弗罗姆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但不久即与弗洛伊德发生分歧，他不满意弗洛伊德过分强调个人的无意识驱动力的作用，忽视社会因素对人类心理的意义。为了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哪些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和哪些需要修正的论断，他企图对马克思的学说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加以综合，把支配个人生活的规律和支配社会生活的规律统一起来。弗罗姆强调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形成和发展的巨大影响，从而突破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这使他成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家。

从1928年到1938年，弗罗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派别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精神分析性格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实质作用》以及《母权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现实意义》（见本书第7—9章）等论文，反映

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发表，它使弗罗姆对马克思推崇备至。他把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视为现时代的设计师。就弗洛伊德与马克思而言，弗罗姆认为二者决非是旗鼓相当的人物，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马克思将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传统、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遗产与社会经济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型科学奠定了基础，因而，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但弗罗姆并未因为弗洛伊德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而忽视他，仍然认为弗洛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其独特贡献业已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在分别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加以研究之后，弗罗姆认为自己已找到了这两种学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把二者综合起来，他的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就是这种综合的尝试。在形形色色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世界性思潮中，弗罗姆与马尔库塞、赖希等人所倡导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别树一帜。1934年，弗罗姆随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一起离开纳粹德国，迁往美国纽约。

在美国，弗罗姆与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进行争论，并占了上风。他从事了广泛的教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活动。他于1934—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社会研究所新校执教。1941年后相继在本宁顿学院、耶尔大学、纽约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授。1946年，他参与创建了威廉·阿朗森·怀特精神病、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研究所，并担任该所主任。1949年，他接受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教授席位，在那里创建了墨西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培训精神分析学家。在以后的二十余年中，除定期到美国讲学、开办研究班外，弗罗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西哥度过的。他于1965年在墨西哥退休，并获得荣誉教授的桂冠。1971年，弗罗姆移居瑞士，继续从事研究和著

述。1980年8月18日去世。

弗罗姆一生著述甚丰，其著作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有些印数达数十万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逃避自由》（1941）、《自为的人》（1947）、《遗忘的语言》（1951）、《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你们就是神》（1966）、《人的破坏性之剖析》（1973）、《占有还是存在？》（1976）等。

《精神分析的危机》（1970），是弗罗姆的一部力作。该书由9篇相对独立的文章构成，它们主要写于60年代末，并收进了30年代初的3篇文章。但这些文章有着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思想，因而有着内在的联系。美国心理学家杜·舒尔茨指出：“在弗罗姆的著作中，全部命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迈克尔·麦科比认为，弗罗姆的著作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精神分析的社会性格论；对弗洛伊德学说的修正；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关于宗教及其对人的发展的分析。弗罗姆本人则以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来概括本书的内容。

对弗洛伊德，弗罗姆不乏崇敬之情，但他并不是跟在这位精神分析大师后面亦步亦趋，而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更新和改造精神分析学。正当精神分析学日益为人们所承认、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弗罗姆却独具慧眼，大声疾呼精神分析正面临着—场危机。表面看来，这场危机的原因是大量开业的医生和病人滥用精神分析的结果，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精神分析从批判的、透彻的、自由的理论变成了实证主义的顺从者的理论。弗罗姆指出，要创造性地发展精神分析理论，只有再次使之成为激进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带有挑战性的理论（见本书第1章）。他通过对小汉斯的著名病例的剖析，具体指出了弗洛伊德本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态度是他的“盲点”，导致他从维护父母权威和男性优越的偏见出发错误地解

释了临床资料（参见本书第5章）。弗罗姆还批评了弗洛伊德的人的驱动力理论，指出它缺乏社会决定因素，是抽象的一般的人。在他看来，人的本性的模式是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的生物的、生理的、心理的潜能的总和，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生存的固有矛盾，它植根于人的生存特有处境的矛盾。弗罗姆在分析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时，区分了无法消除的“生存的两歧”和可以消除的“历史的两歧”。前者指个体化与孤独感之间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人的潜能的实现与生命的短暂之间的矛盾等人类生存所必然面临的矛盾；后者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不利的社会环境、外部条件所造成的矛盾。这是他对弗洛伊德的人的本性模式的一大改进（参见本书第2、8章）。

弗罗姆在本书中按自己的方式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阐述。他认为，马克思对人的认识、对心理学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马克思不仅关心社会规律，而且关心个人、人的动力和人的性格。弗罗姆指出，马克思是从人的本质和一般人性出发的，马克思的方法是研究现实的动力学的辩证方法，他区分了永恒的动力与相对的动力，这种动力心理学成了弗洛伊德深层心理学的前奏。弗罗姆尤为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畸形的人与全面发展的人的论述，只要人对他人、对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关系，而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关系，人就会丧失自身，成为异化的人。与此相联系的是需要理论，马克思区分了真实的人的需要和虚假的非人的需要，弗罗姆由此却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认为贫穷和富有并不矛盾，它们都依赖于人的需要的受控。同样，他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关于爱情的言论中，却看到了它们是由人的生的倾向和死的倾向所推动的。他把马克思的整个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与弗洛伊德关于意识是由人所不知道的无意识力量来推动的思想相提并论，认为

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最核心的部分。弗罗姆还把人性格的结构作为联系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纽带（参见本书第 3、8、9 章）。

这样也就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之间进行了巧妙的综合：把人的生物本能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把心理的批判与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把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等同起来，把人的性格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联系起来。显然，这种综合既曲解了马克思，又背离了弗洛伊德。因而，弗罗姆同时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指责：一方面，他被看成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另一方面，他又被说成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然而，弗罗姆的综合自有其独特之处，读者不妨自己揣摩体会，笔者不敢越俎代庖。

实际上，弗罗姆本人对别人把他划归“新弗洛伊德主义”、“文化学派”之类是不满意的，他宁愿把自己的思想称为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弗罗姆所谓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无非是把精神分析方法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使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互补充而已。弗罗姆认为，对人的基本的社会需要的理解，是理解人类自身的基础。健全的人有哪些需要呢？在弗罗姆的体系中有五种主要的需要，即联系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根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但由于社会因素的存在和影响，个人要在同一时间内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各种需要之间反而会互相冲突。而每种需要的满足又可向两个方向发展：联系的需要可以表现为爱或自恋，超越的需要可以表现为创造性或破坏性，寻根的需要可以表现为友情或“乱伦”，认同的需要可以体现为个性或一致性，定向的需要可以体现为理性或非理性。因此，成长中的个人和发展中的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是通过爱的创造性的工作达到与外部世界协调一致，或者通过破坏个人自

由以寻求安全和归属感，这就是健全的社会和个人与变态的社会和个人的区别之所在。弗罗姆据此划分了不同的社会性格（早期他称社会性格为社会的里比多结构）。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市场型、恋生癖型和恋死癖型等类型的社会性格，是在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中生活的人所持有的维持心理平衡的心理机制，但都是不健全的、不成熟的性格，它们是人本性中那些使生命进化的潜能的显现。只有生产型或创造型的社会性格才是健全的成熟的性格，是人使用自身的力量实现其固有的潜能的能力。弗罗姆在古代以母亲为中心的社会中看到了这种健全的社会性格的萌芽，并认为未来应在更高的阶段上回复到这样的社会（参见本书第6、7章）。弗罗姆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认为人格的健全发展必须摆脱这个病态的社会。在临终前的一次谈话中，弗罗姆说：“今天有许多人都在寻找一条道路，一条真正使人得到满足、使人得到尊重的道路。他们认识到，为了成功、金钱、竞争、剥削而生活是不幸的根源。”（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年第12期）弗罗姆寻找的是一条人道主义的共有社会主义的道路。他的方法是通过改造人的非创造性的社会性格来达到改造现存社会的目的。在他看来，社会性格是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经济基础创造一定的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又创造一定的观念，观念一旦创造出来又反过来影响社会性格，并间接地影响经济基础。仅就这一点而言，弗罗姆的社会性格与普列汉诺夫社会结构学说中的社会心理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弗罗姆并未超出社会心理学的范围。弗罗姆提出，要以人道主义的计划来指导管理的计划（见本书第4章），建设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工业社会，他对此满怀希望。然而，在并不推翻私有制，也不彻底消灭阶级的条件下，人道主义的经营管理充其量只能带来有限的生产力的增长而已，而不能彻底改变人的境况。

《精神分析的危机》一书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弗罗姆的思想是大有裨益的。限于水平，译者恐怕未能将原作才气横溢、文思敏捷，大家手笔，贴切地转达给中文读者。错误之处，敬请指正。本书根据英国企鹅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重印版本译出。译者在此要感谢陈华教授在百忙中抽空审阅部分译稿，感谢范建荣博士的鼎力相助，特别要感谢年近古稀的文铭先生为我们字斟句酌地审读和誉清文稿。译者曾就若干疑难问题请教了美籍学者M·德克森博士和J·斯岱宾先生，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1987年冬

目 录

前言.....	(1)
一、精神分析的危机.....	(3)
二、弗洛伊德的人的模式及其社会决定因素.....	(34)
三、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的贡献.....	(52)
四、人道主义的计划.....	(66)
五、俄狄浦斯情结：评小汉斯病例.....	(76)
六、母权论在今天的意义.....	(88)
七、母权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现实意义.....	(93)
八、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	(120)
九、精神分析性格论及其对社会心理学 的实质作用.....	(145)
后记.....	(170)

前 言

这本论文集收集了我在1932年至1969年间的不同时期写成的论文，这些论文由于论述了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共同主题而形成了一个整体。之所以决定出版这些最初在德国发表的论文，是因为它们仍然是最完全、最恰当的关于理论基础的陈述，我后来关于该学科的工作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在我看来，这些论文在今天尤为逢时，因为当今在这个论题上，特别是在马克思的理论 with 弗洛伊德的理论之间的关系上有大量的探讨，我担心这场讨论有时陷入外行、混淆视听。对于这些早期论文，除了在今天我将不会使用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来写之外，几乎没有要作变动的地方；而这对于思想主流也无关系要。我抵挡住了对这些论文的内容作任何修改的诱惑，但在脚注中指出了它们呈现的原来风貌与我现在的观点之间的差异；我所作的唯一变动是把那些显得过分冗长的段落或那些于今无裨的剖毫析芒的论述加以删节。

开篇的长文《精神分析的危机》是专为本书而写的，此外还有《母权论在今天的意义》以及《后记》也是如此。《精神分析的危机》主要探讨了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治疗方法，该文象第2篇关于弗洛伊德的人的模式的主旨一样，试图分析精神分析学发展的社会决定因素。

各章之间也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刻所写的。正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各章不仅在风格上有所差异，而且还存在一定的重复。通过删节本来可以避免这一点，但这将会破坏每篇文章的特色。祈望读者对此海涵。尤其因为，虽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重复的论断，但它们并非千篇一律，思想的表达往往在某一点上比另一点更充分，故而可以用一个思想来阐明另

一个思想。

《精神分析的危机》这篇论文总结的一些观点在一个更大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篇尚未发表的东西标题暂定为《人道主义的精神分析》，这部分内容得到了美国公共卫生署下属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支持，授予了第5 ROIMH 13144—02号研究拨款。

我衷心地感谢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的约瑟夫·坎尼先生，他对编辑这部书稿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和最大的理解；衷心感谢杰罗姆·布拉姆斯博士，他帮助作者探讨了自我心理学。

埃里希·弗罗姆

1970年1月

一、精神分析的危机

当代精神分析正经历着一场危机，这从申请到精神分析研究机构受训的学生人数的减少，从向精神分析学家寻求帮助的病人数量的减少，就可以一望而知。近年来相互竞争的不同疗法相继出现，纷纷声称有更好的疗效，而且省时省钱。十年前被城市中产阶级认为可以解决其精神痛苦的精神分析学家，今天却被心理疗法的竞争者置于防守地位，失去了在治疗方面的垄断地位。

要评估这场危机，回顾一下精神分析治疗史是有益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精神分析开创了一个新领域，从经济上说则开辟了一个新市场。在那以前，一个人得精神错乱或患有痛苦的交往障碍症状，才能够得到精神病学家的帮助。那些不甚严重的精神烦恼，则被认为属于牧师或家庭医生的职责范围，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他应当自己去处理这类烦恼，如有必要，还得默默地忍受痛苦。

弗洛伊德开始其医疗生涯时，处理的是常规意义上的“病”；病人们虽然不是精神病患者，但却具有恐惧症、强迫症、歇斯底里症等恶性症状。此后，精神分析开始逐步地把其方法应用到那些传统上不会被视为有“病”的人们身上。“病人们”满腹牢骚来就诊，诉说自己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抱怨不幸的婚姻、无端的焦虑、孤独感的痛苦和工作能力上的障碍，等等。与过去的做法相反，这些抱怨被划为“疾病”，精神分析学家作为一种新型的“帮手”，注定要关照“生活中的种种

困境”，而在此之前，这类困境从未被认为有求助于专业人员帮助的必要。

这一事态的发展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但它最后在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中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直到不久之前，都市里某个亚文化群的人“聘请自己的分析师”几乎还是“习以为常的”；人们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睡椅”上，就象人们曾习惯于到教堂或寺院里去一样。

精神分析勃兴的原因很容易认识。本世纪这个“焦虑的时代”造成了日益增长的孤独感和隔离感。宗教的崩溃，政治的表面无效，完全异化的“驯服的人”的出现，这一切剥夺了都市中产阶级的定向标准，使他们在—个无意义的世界上丧失了安全感。虽然少数人似乎在超现实主义、激进政治或佛教的禅宗中发现了新的定向标准，但一般说来，摆脱了幻想的自由派要寻找一种哲学，对这种哲学，他无需彻底改变世界观，即无需变得同朋友和同事们“不同”，就可以加以赞同。

精神分析满足了这种需要。即使症状未得医治，能向一个耐心地、多少是同情地倾听的人倾诉，这也是一个巨大安慰。精神分析学家的倾听要取报酬，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欠缺，或许根本不是什么欠缺，因为人们向精神分析学家付酬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种治疗是严肃的、值得尊敬的、富有前途的。除此之外，精神分析从经济上说还是一种奢侈品，因而声望颇高。

分析学家提供了一种宗教、政治和哲学的替代物。据认为，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生的所有秘密：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童年经验在当前的再现，一个人一旦理解了这些概念，就再也没什么神秘的了。一个人成了把分析学家当作自己的教士的、有点秘传性的教派的成员，他在睡椅上打发时光就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那么困惑了。那些并未患什么明确

的病症，而只有一点普通的不适的人，尤其如此。他们为了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有所改变，需要弄明白一个非异化的人应是什么样的，过一种以存在为中心、而不以拥有和利用为中心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这种了解可能需要彻底批判自己所属的社会，批判这个社会的公开的、尤其是隐蔽的规范和原则；需要勇于割断许多带来舒适的、保护性的联系，勇于发现自己处于少数派地位；还要求更多的精神分析学家超然于受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工业化生活的心理混乱和精神混乱之外。

常常可以看到在病人和精神分析学家之间有一种“君子协定”；双方都不想被一种基本上全新的经验所动摇；他们对微小的“改善”感到满意，下意识地对方没有揭穿（用R·D·莱恩的术语来说）那无意识的“串通”（collusion）而感谢对方。只要病人来了，谈了，付款了，只要分析学家听了，“解释”了，那么，这种游戏的规则就得到了遵守，双方都对这场游戏觉得满意。此外，聘语分析学家常常是用于避免生活中可怕的、但却不可避免的事实；不得不作出决定，不得不承担风险。当一个困难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决定不可避免时，精神分析的癖嗜者便把现实的冲突转化成为一个需要“深层分析”的“精神病上的”冲突，有时直到要求作出决定的形势消失为止。所有这么多病人绝不形成对分析学家的挑战，分析学家对他们也不成为问题。那些不自觉地参与“君子协定”的人，根本不想成为一种挑战，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平静”生存的小船摇晃。加之，由于精神分析学家越来越深信有大量的病员来源，所以其中许多人势必懒懒散散，相信这么一种市场假定：因为他们“市场价格”高，他们的“使用价值”也必定高。靠着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力量和声望，许多人通过了从入会到毕业的仪式后，就以为自己拥有了“真理”。在一个靠组织的大而有力作为真理保证的世界中，他们只能亦